

中國社會

從不變到巨變

劉創楚、楊慶堃 著

第二版

中國社會

從不變到巨變

(第二版)

劉創楚、楊慶堃 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中國社會：從不變到巨變》

劉創楚、楊慶堃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1989, 2001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62-201-983-8

1989年第一版

2001年第二版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 • 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件：cup@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cupress

The Chinese Society (in Chinese)

by Chong-chor Lau and C. K. Ya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9,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01-983-8

First edition 1989

Second edition 200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uhk.edu.hk/cupress

Printed in Hong Kong

第二版序

本書出版於八十年代，改革伊始，開放方興。無論多麼大膽的作者，也不敢預言中國的變化，能像剛過去這十多年這麼大。社會學家所關注的制度沿革、組織變遷，往往要經歷數代，始有新模式可以觀察。但中國社會幾乎數年一代，改變的痕跡已清晰可辨。在新版中，我們集中剖析五個方面的當代變遷：組織方面，我們的命題是組織系統已經形成，傳統社會「兩頭重、中間輕」（缺乏中間組織）的格局已經扭轉。通過組織分析，並與美國社會比較，結論是進入新世紀的中國應可稱為「組織社會」了。但我們亦指出，「組織起來」只是長征第一步，今後的組織變遷將轉向提高效率取得效用的課題。

制度變革將是中國人完成百多年現代化未竟之業的新挑戰。改革所孕育的新形勢正在催生一個新型的制度文化：我們觀察到法律制度正在急速地轉變，以適應市場化與私有化的要求。與此同時，集體主義退潮與個體取向漲起清晰可見。目標多樣化已取代了絕對理想或絕對目標。種種跡象顯示，正在形成的制度方向是朝向理性化的社會。我們的分析亦指出，當前制度充滿過渡時期的特色。但未來觀察的有益焦點應是現代化及理性化的制度發展。

當代中國農村是個「計劃與市場孰優」的社會實驗室。我們追蹤了這場古今中外罕見的實驗。這番分析卻得到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結論：中國人幾千年來「以農立國」是個天大的誤會。改革後農村工業化及專業化的進程指出了真正的出路。現代化的普遍真理是「非農化」，農村社區實驗的結果證明，中國並不是例外。

和所有發展中社會一樣，中國城市面臨兩大挑戰：如何提高經濟能

力以吸納迅速膨脹的城市人口？社會如何建立有效組織去令市民歸心？在第二版中我們追溯了「商埠城市化」所遺留的歷史問題，亦分析了六、七十年代逆城市化的政策問題，結論指出這些兩難問題仍是二十一世紀中國城市的挑戰。

剛過去的短短五十年或兩代人間，中國社會經歷了兩次「再分層」歷程：前一代人被驅使去追求平等、縮小差距，結果是除了政治權力外，「無階級社會」(classless society)幾唾手可得；後一代人則面對「讓一些人先富起來」、「下海」等誘惑，眼睜睜看著權力、財富、名氣等力量在周遭凝結地位，安排階層，最後不由自主地被安排進一個陌生的階級制度中去。

第二版雖力求追上中國社會的巨變足跡，但仍一本舊貫堅持「根據事實，綜合結論」的原則。凡實徵資料不足的題目，我們仍堅持不發空泛的議論。

劉創楚序於香港中文大學

第一版序

本書從初稿到出版經過了二十年。一九六八年楊慶堃老師來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客座教授，開了一門「社會學與中國社會研究」的課，我是班上的學生。當時一群有心的學長，詳細地記錄下老師的演講，最後由黃裕鏗兄總其成，是為初稿。初稿曾由金耀基教授批校過，也曾在部分人中間傳閱。後來可能是由於我長期充當慶堃老師助手之故，裕鏗兄把講稿交給我保管。

自從我十多年前返母校任教以來，研究工作的中心是中國社會。每有體會，總將之與講稿相對照，遂發現老師的大部分見解，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及至近年，老師為協助中國復興社會學，把我帶到大陸許多學府的講台上，我始強烈地感到，當年老師以中國社會研究作為社會學之入門，不但事半功倍，而且深具啟發的意義。

到了三年前，我才向老師提起把講稿重寫成書的意思。主要的原因是近年老師深感社會學缺乏中文讀物，不利中國社會學的發展，常鼓勵我做這方面的工作。而我則受講稿之惠良多，覺得如它能成書出版，必有助於其他的初學者修習。

經過多次的斟酌，初稿作了如下的修改：關於社會組織、制度及社區的主要見解，大都保留。它們是中國社會經歷現代變遷最受衝擊的部門。我們的分析策略是闡析傳統中國社會這些方面的性質，再研究其現代變遷。我們所以花大量篇幅於描述傳統的性質，是基於一個觀點，即中國的社會組織、制度和社區是植根於傳統社會系統之中的。這是中國社會的現代轉變如此困難的主因。現代變遷部分，因實徵資料有限，故只提出我們的命題，作為繼續研究的綱要。由於最近二十年中國變化甚

大，許多新現象湧現，所以這些章節需要全部重寫，以體現八十年代的面貌。

關於社會分層、運動及變遷的文字，是初稿所無，為本書而添寫的。當時的演講，頗受時間的限制，無法滿足書本的體例。為顧及成書的格局，由本人作狗尾續貂的工夫。其中，社會運動一章所用資料是慶堃老師多年心血的結晶，許多觀點也是他所發微的，故不致影響全書風格之統一。

慶堃老師研究中國社會超過半個世紀，我投身於此領域也有二十年了。此書不敢稱為一得之見，只能說是一個小結。它多少代表了作者對於這門學術的觀點。當然，由於受到最初講課的時間限制，影響到論證命題比較不周延，這類的缺失是難免的。準此之故，我們只擬把此書獻給一般讀者。至於專業社區，我們已有學術專著可供批評。

過去一百年可謂中國的巨變世紀。雖然本書的意旨是認識變遷的模式，但中國社會的變遷步伐，往往超越觀察者所掌握及分析資料的速度。作者縱未間斷對中國社會的研究，亦不敢肯定一些章節出版後不會變成明日黃花。讀者的批評必有助於我們未來的探索。

劉創楚序於香港中文大學

目 錄

第二版序	vii
第一版序	ix
第一章 社會學與中國社會	1
一、社會學理論與中國的社會現實	1
二、社會學的性質和功用	2
三、社會學的觀點	4
四、社會學的方法論	6
五、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	9
第二章 社會組織	15
一、中國社會組織的性質	15
二、中國社會組織的現代變遷	19
三、中國組織模式的可能取向	24
四、當代組織變遷	29
第三章 社會制度(上)	35
一、社會制度的性質	35
二、制度理論與中國社會變遷的關係	38
三、社會制度與價值類型	40
四、當代制度沿革	45
第四章 社會制度(下)	57
一、家族制度	57

二、政治制度	64
三、教育制度	72
四、宗教制度	75
第五章 農村社區	81
一、農村社區的重要性	81
二、近代農村社區的特色	81
三、農村社區的現代變遷	86
四、農村社區的理論和研究	89
五、農村發展的社會實驗	91
第六章 城市社區	99
一、城市與中國社會	99
二、城市社區的理論	100
三、城市社區的分析方法	109
四、中國近代城市變遷	123
第七章 社會發展	131
一、停滯論	131
二、演變論	134
三、社會發展階段問題	136
四、歷史社會學	138
第八章 社會分層	141
一、從分化到分層	141
二、傳統分層的性質	142
三、歷代的社會流動	144
四、現代中國革命與社會再分層	149
五、改革與階級系統	152
第九章 社會運動	161
一、社會運動的意義	161
二、中國現代社會運動的研究	167

第十章 社會變遷	181
一、千年僅見的變局	181
二、現代社會變遷的性質	188
三、中國社會的現代變遷	201
參考書目	211
中文	211
英文	213

第一章

社會學與中國社會

一、社會學理論與中國的社會現實

社會學是西方社會的產物。它的概念和方法都是由西方社會抽出來的。一種理論的可靠程度，要視乎資料的性質。如果資料是由一社會文化抽出的，其可靠程度就僅限於該社會文化。¹這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分別。

社會學有與中國社會相合部分。這是社會學的普遍準確理論部分。像地位和角色(status and role)理論，是無往而不能用的概念。²地位最重要的涵義是高低；角色的意思是怎樣做、做甚麼事。做父親的應怎樣做，做母親的應怎樣做，做兒子的應怎樣做。中國的觀念叫做「名」。即所謂正名：名怎樣，便應怎樣做。柏生思(T. Parsons)有一句很簡單的話指出地位和角色的分別：「你佔有一個地位，但扮演一個角色。」³每個社會都有地位的高低，每個人都有其配合的角色。像這種普遍性的社會學理論，是可以應用於中國社會的。

社會學理論和中國社會現實相違背的例子：美國社會學家奧朋(W. F. Ogburn)，在他的《社會變遷》一書中，提出了「文化墮距」(cultural lag)的理論。⁴他提出社會變遷時社會各部門變遷的速度不同。有的很快，有的很慢。比較來說，技術上的，或與技術有關的經濟事物變得快。與文化有關的組織形式變得慢。例如，原子筆出現不到兩年已風行全球，但宗教則變遷甚少。在歐美，一些宗教儀式，還是一千年前的。

在西方，此理論被證明是準確而且實用的。⁵例如：發明了汽車，於是築公路，通過法律及交通規則，建立交通行政組織，最後，財政預

算、社會規劃都跟著汽車公路走。變遷的先後次序明顯。

但是中國的情形是否一樣？是否先有汽車？不是的。第一是讀書，學習汽車原理，成立交通部，築公路，借錢開工廠，然後才有汽車。中國社會最近百多年，是先有教育改革、社會改革、政治改革，先有種種運動，最後才出現技術的改變。改革的目標，正在於建立技術基礎。所以中國的現實是「技術墮距」(technological lag)。像這類與中國現實相違背的理論，就不能一成不變地照搬了。

理論必須通過事實的考驗，結合社會學和中國社會研究，是做比較社會學的工作。用社會學理論為基礎，拿中國的事實做補充，以現象補充理論的不足，希望產生出一套比較完整的社會變遷理論。這就是本書的旨趣所在。

二、社會學的性質和功用

社會學是研究社會諸部門之間如何配合活動的學問。在中國社會，要辦一件事，例如興建工廠或修改法律，都不易成功，因牽連到社會系統的各方面。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就是這各方面的牽連，一個制度與另一制度間的關係。

社會學到目前為止，雖然未能告訴我們整個社會系統的構造如何，以及如果要改變其中一部分的話，整個體系又應如何改變。但社會學近年來進步的地方，就是它雖然未能在整體方面作詳盡的研究，但在每一部分來說，它已經脫離了孤立的做法。孤立的做法，即研究政治，只研究政治；研究經濟，就只研究經濟。現在則不同，研究經濟，必須研究經濟以外有牽連的事情，以及有關方面的社會活動。這就是所謂「行為觀點」(behavioral perspective)。⁶

行為觀點是一種新的發展。研究政治，現在就是研究政治行為。研究經濟，就是研究經濟行為。研究教育與社會的關係，亦是行為的觀點。

例如政治學，傳統的概論，所研究的多是政府組織、政府部門、法律規條、政黨關係等。這些範圍，在今日只不過是政治學的一個小角

落。今天的政治學研究，是朝「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方向走。它研究一個人為何在政治上有某種行為。一個人為甚麼選某候選人？他的社會經驗怎樣？其社會背景又如何？他是有教育的？富有的？其人格類型又如何？是自私的？抑或是肯犧牲的？這樣，政治學家根據社會生活及影響到政治生活的各方面：如地位、收入、教育、家庭傳統、職業等因素，作調查研究的基礎加以分析。

又例如經濟學。以前經濟學研究的，是生產、消費、交換、分配四大類。每一類都研究供求率、邊際率、效率、投入與產出。他們研究的是短期的事，如下月或明年某貨品需求若干？但這一類事，有一很大的假定，就是經濟人(economic man)的假定——經濟人的行為，以價廉物美為原則，是自利的(self-interest)；又列出需求表，計算經濟的起落，同樣是基於經濟人的假定，以為人是理智的。

但人的需求是會轉變的。為甚麼轉變？這問題是傳統經濟學所不能回答的，在這裏，社會的價值觀念是十分重要的。在一些社會，人們追求華服美飾，但在另一社會，粗衣麻布被視為英雄本色。經濟學解釋不了這種轉變。這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

一些人為甚麼要買漂亮的衣服？為何放棄價廉物美的原則？為何要「炫耀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⁷原來他們要找尋個人的地位、情感的滿足，甚至要滿足瘋狂的慾念。這些都是非理性的(irrational)行動。事實上，我們每日所見的純粹循著合乎經濟動機的消費行為，並不很多。我們大部分消費行為，是受著習慣、情感波動、社會競爭、價值觀念主使的。

其實不單只政治學及經濟學，社會科學的各部門都看到行為觀點，都擴充研究到其與社會生活諸部門的關係，也即是見到社會學滲入其中。

社會學的理论價值，就是這麼一個整體的觀點。如何運用這個整體觀點去了解中國傳統社會及現代變遷，也就是「社會學與中國社會研究」這個領域的挑戰。它必須以實踐證明社會學的功用。

社會學在實際生活中的功用，西方社會已累積不少個案。⁸茲舉美國的退伍軍人教育權利法案(G. I. Bill)一例加以說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動員了二千萬人參戰。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二千萬人同時退

伍，返美國工作。但困難在於這樣勢必有很多人失業，而種種社會問題便會產生。有一個辦法是，凡退伍軍人希望入大學或職業學校讀書的，均由政府支付學費。這樣，至少可以吸納一部分人進入非生產部門，減少就業競爭，同時又為國家培養人才，為國家增加日後的生產能力。但問題是政府在未推行這法案以前，必須知道要支出多少？有多少退伍軍人願意讀書？讀甚麼書？於是他們用分層抽樣(stratified sample)作調查，得出結果推測有百分之八的退伍軍人會繼續讀書。若干年後，統計結果是，退伍軍人中繼續讀書的佔百分之八點一，與調查結果相差只有千分之一，可見社會學到此，已經脫離了只說理論而進入專業的階段。現在，每一類型的社會生活，可以說是不會沒有社會學的人士在內。諸如經濟、醫藥、公共衛生、政治、選舉、城市規劃、社區發展，乃至廣告行業，沒有社會學的人在內，將是技術上的大損失。當然，在任一領域證明社會學的實用，是不能徒托空言，而必須拿出成績來的。社會學如何能貢獻於中國社會，是有待證實的。在我們未步入實質研究以前，先敘述社會學的觀點。

三、社會學的觀點

社會學的觀點，就是全觀法(holistic approach)。但這樣一個觀點，必須怎樣運用才適當呢？首先我們必須從社會學、哲學和科學之間的關係去探討。

其實科學和哲學的分界並不十分清楚。非要加以區別不可，簡單地說哲學是邏輯思維，而科學則是根據邏輯去處理現實的資料(factual data)。

如此區分，科學與哲學的分界，就是側重事實與不側重事實之別。但這只是很勉強的說法，因為研究哲學的人，一樣側重事實。只是哲學家多數沒有一步一步地有系統地綜合事實，作出結論，從而安排出一個規律。以前的社會學，大部分就是哲學，是運用邏輯與想像，去推測結論，而沒有很嚴謹地搜尋事實，去證明一個概念或原則。這類的社會學工作並不令人滿意。更重要的是，他們研究整個社會系統、社會組織、

整個文明、文化乃至全人類，範圍異常廣泛，想像往往超過事實。

斯賓格勒(O. Spengler)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先後出版分為兩冊的《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書，⁹ 結論很簡單：一切人類文明都走循環式的。他用季節做比喻，認為一切文明有春天發芽的時候，有夏天茁壯的時候，有秋天從盛年趨於衰落的時候，也有冬天死亡的時候。他認為，每一文明都如此循環，如埃及、希臘、羅馬、中國，以及當時的歐洲文明。他當時正處於世界大戰漩渦的時代，自然容易觸發悲觀思想。說到事實，我們不能說斯賓格勒的理論違反事實。問題是，現在的歐洲文明，是處於春天、秋天，抑冬天境界？沒有人可以作出肯定的答覆。美國文化呢？中國呢？從文化歷史看，美國雖然年輕，但有許多事實如吸毒、犯罪，則表示它已經開始衰落。至於中國文化雖然悠久，但又有一些生機勃勃的現象，表示它仍大有希望。更重要的問題是，究竟用哪一種方法，哪一標準來斷定某一文明是到達哪一階段？斯賓格勒沒有指出。

另一個例子是沙羅鐸(P. Sorokin)的《社會文化動態論》(*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¹⁰ 它的主要理論是：文化有二極，一端為理想型(ideational)的文化，另一端則為實感型(sensate)的文化。前者為理想時代，文明興起時代，建立基業的時代，受一強烈的理想所吸引號召。此時的人注重理論、道德、行為標準及理想。但當一個社會建設完成之後，人們再不為理想的號召所推動，轉而注重物質享受，文明踏入實感型，開始衰落。沙羅鐸說一切文明均循環於此兩階段。我們若重溫世界歷史，可以發覺的確有這些循環的情形存在。但我們現在處於哪一階段？若我們分析，所用的標準和方法又怎樣？大家很難決定。

這一類的社會學理論，哲學成分多於科學。我們若稍加留意，可發現不少有關人類文明的興衰循環理論。一如孟子所說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¹¹ 到底哪些人才可以列為王者？有多少王者興起？這樣的理論是哲學而非科學。

這問題在中國人身上更加嚴重。數千年來，我們有不少這類想像豐富，有時很合邏輯的理論，但最後發展成為策論、八股文等千篇一律的鴻篇巨著。這種發議論的風氣，這種缺乏科學精神的風氣，被人誤認為研究社會學的方法。直至現在，仍有這一類的書，議論多而事實根據

少；即使有事實論據，也不加以系統地整理，去證明一種理論。

故此，社會學的觀點，也即全觀法的運用，不外「根據事實，綜合結論」八個字而已。中國人發議論只舉一、二個例子證明，就將之當作事實根據，卻不知道這些例子，很可能就是例外；即或不是例外，我們也不知這些例子的普遍程度。這種發議論的習慣，使得中國的科學一直落於人後。採納社會學的觀點用於中國社會研究，必須摒棄這個習慣，轉用社會學的方法。

四、社會學的方法論

社會學的方法首重系統的思考。

系統的思考方式可根據三項原則：

- (1) 變項的選擇(selection of variables)。
- (2) 關係的建立(form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variables)。
- (3) 邊界的情況(boundary conditions)。

變項指研究的問題包含哪些因素，這些因素之間有何關係，以及環境有甚麼影響。

和系統的思考方式相同的是「建立模型」(model building)這個口號。一個模型是將一件複雜的事抽出幾項最重要的因素，再建立它們之間的關係。

建立模型有兩種方式：

- (1) 演繹式(deductive model)：
事先想像出一個系統，然後去觀察現象。
- (2) 歸納式(inductive model)：
觀察之前並無成見，只從研究結果作結論。

中國人的傳統思考方式，集中於具體思考，而忽略抽象的思考。

在韋伯(Max Weber)的論文集中，有一篇並不抽象而相當具體的小文章，是描述美國一九二零年的一個小城鎮。這時秋盡冬初，美國中西部(mid-west)開始結冰。星期天，韋伯去參加禮拜聚會，見到一個人要求受浸禮加入教會。在這嚴寒天氣，他為甚麼要受浸加入教會呢？原來

他要到鎮上開銀行，由於這鎮上全是浸信會的人，他不加入教會，便沒有生意做。¹²

中國有所謂任用私人的傳統，不是自己的親戚，便摒諸門外，歷史上盛宣懷辦漢冶萍煉鋼廠，引用私人。原本做工程師的人，必須有專門知識，但他卻以外行的盛家人來充數。

做抽象思想的人，他將各事件的重點抽出來。像上面，都是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的例子。抽象思想是將許多事情的共同性質抽出來。

抽象有很大的淵源在於分類。世界上的事情無論是怎樣地花多眼亂，只要我們把花一科科地分出來，我們就不會眼亂而有條理。如將每種花的性質、顏色、生長歷程加以研究，就可獲得初步的科學知識。

一切研究工作的起點是分類。抽象思想的起點也是分類。中國沒有分類這一件事。比較中西思想發展史，西方有的，中國差不多都有，只缺少這一樣東西。生物學的分類做得蓬蓬勃勃是在希臘，中國則沒有人做分類的工作。從分類的工作，產生了通詮(generalization)，產生了概然性的定理，因此產生了抽象的思想。中國古聖賢萬事俱備，只是沒有作分類的工作，這是我們知識傳統的一個缺憾。今天對社會學有長遠興趣的人，就不能離開分類這概念。

我們無論觀察何種事物，都必須用分析的眼光，把大規模、混亂而複雜的情況，加以條分縷析，分別出裏面不同的部門或(部子)(component)。所以縱使中國的傳統缺乏分析的抽象概念，我們也應該保持分析的立場，以觀察社會事物。

我們其實可以說，中國有分類的辦法而沒有分類的這個概念。這可以從中國的「地方志」這一類志書而得到證明。中國的志書是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未發掘的一個豐富寶藏，其資料雖多，但尚未有人好好地將它分析研究。

從地方志的例子可知，中國原來也有分類這事實。縱使小至一個縣，甚或更小的地方，均有一個標準的目標，選擇重要類別的事物加以介紹。通常一本地方志書包括下列各類：¹³

- (1)輿地：包括疆域、山川、氣候、物產等。其中尤以疆域最重要，因為在行政賦稅方面，需要明確的疆域，始可避免產生不必要的糾紛。